

【文化论坛】

文学批评不应只说好话

□阿三

山东一位作家出了一本新长篇,前段时间在山东师范大学开了场新书发布会,来了很多文学批评家。山师文学院院长杨存昌的开场白让笔者印象深刻——

不要只说好话,对青年作家可以说点刺耳、尖锐的话,相信他们能够接受。一次文学讨论会,如果在这个作家之后5到10年的创作里都能起到好作用,才是有价值的讨论会;如果只是让作家在会后的晚上美滋滋地睡一觉,那不是好的讨论会。

说实话,这些年参加过

的文学研讨会很多,有时候,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倒不是笔者定力不够,而是一场研讨会经常会演变成一场“称颂会”“表扬会”。期待的高论很稀缺,各种赞美倒是不少,诸如立意多么高、结构如何巧、文字又是怎么美,不一而足,总归是气氛和谐,宾主尽欢。或许,这就是杨老师所谓可以让作家晚上美美地睡一觉的讨论会吧。

每每这个时候,笔者总会忍不住偷偷看一眼坐在中间的作者,视线聚焦在他手

中悬着的笔。因为一场好的研讨会,对一位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的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批评家如果能够秉持客观的态度激浊扬清,不溢美,不隐恶,谈出优点,指出不足,很大程度上真会对一位作家之后5到10年的创作起到好作用。然而,这样的场景确乎不多,即便是偶尔出现的批评,也是十分含蓄,将“春秋笔法”的技艺演绎得十分纯熟。

上个月《文艺报》有篇文章,指出了目前文学评论生态存在的问题,标题的态度十分鲜明:文学评论要拒绝“套路”“黑话”。作者直接点出当下文学评论生态出了问题:文学评论的本职是表达态度、亮明褒贬,如果连这态度都还需要作者去揣测、猜想甚至对照着注释参悟玄机,那就不属于惊喜而属于失职了。

看到这段话,让笔者想

起作家阎连科曾经表达过的观点,他将文学分为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三要素,这三者缺一不可,而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推动文学的发展,而且会矫正文学的发展。作家莫言也曾怀念过上世纪80年代刚创作出《红高粱》时,文学批评对他创作的推进。很显然,一针见血的文学批评或许会让作家一时脸红发汗,但如果这种批评是出于批评家不带个人偏见的独到分析,又何必遮遮掩掩,王顾左右而言他呢?

目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批评生态亟待扭转。如果批评只是为了作者的面子着想,或者只是为了给作者站台站、多卖几本书,而不是出于公心,出于独立的思考,批评的价值只会越来越弱,文学批评也会越来越沦为一个圈子内的游戏而不受读者的待见,那些真正有追求的作家也会逐渐远离这个圈子。

中国人讲面子,但有时候或许我们低估了作家的“雅量”。毕飞宇在新书《小说课》里将小说比作“公器”,梁漱溟也用过类似的比喻,他和熊十力是一生至交,但对熊十力书中不足的批评仍然不留情面,他的观点是“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既然小说、学问是公器,不是作者的私有财产,那对它的批评就不仅仅关乎作者个人了。用毕飞宇的话说,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于激励想象,在于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他这一段话或许可以打开那些有顾虑的批评家的心结——因为“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第三只眼】

母亲节为何如此受追捧

□王昱

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已经成了一个你想忘都忘不了的节日。在这个星期天,打开电视、手机、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媒体煽情的宣传。商家也想尽办法在这一天借着母亲的借口掏空你的钱包,什么“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亏欠的人”“你在这一天欠她一个惊喜”。母亲节,俨然已经成为继情人节之后最受中国人热捧的西方节日。

感恩母亲当然好,但中国人对“母子之情”的认同之强烈,说来有点奇怪。母亲节虽然最早在美国创立,但在其倡议者安娜夫人提出该号召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少有人响应,因为在美国,母亲与儿女之间的情感是很私人的感情,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家庭中会非常不同,所以很难引起共鸣。该节日最终创立,是乘了美国20

世纪初“节日风潮”的东风。同期美国其实创立了不少类似的节日,但绝大多数(比如父亲节)都没有像母亲节这样在中国受热捧。

母子之情,在外国人那里是人的诸多感情中的一种,但在中国,它显然成了最重要的一种。中国人对母子之情认同的强烈,产生了不少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比如下跪求饶时,最有效的告饶手段永远是“上有七十老母需要供养”。而女友那个“我和你妈同时落水”的问题则几乎是中国男人的集体噩梦。

这些中国人意象中的经典镜头,在西方人看来都很匪夷所思。在好莱坞大片里,支撑主人公活下去的动力通常都是爱人、孩子,而绝少有母亲。西方传奇故事里的经典桥段也是《蜘蛛侠》《超人》里的“英雄救美”而非《宝莲

灯》式的“英雄救妈”。在西方人的灾难伦理中,一个人在灾难面前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至于母亲,则应由她的配偶来保护。这种思路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中很容易沦为“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

中国人为何如此“恋母”?其原因恐怕得从我们的传统中去找。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圣人,比如孔子、孟子、曾子、朱熹,都出生在早年丧父的单亲家庭中。由他们所创立并发展的儒学,虽然在表面上提倡孝道时更强调“父子子”的对父行孝,但如果真的落到实际操作层面你就会发现,一个思想健全、人格独立的父亲很难承载这样浓得几乎化不开的“孝”而不产生违和感。所以,中国人理想的行孝故事中,主角大多都是母与子,比如最能代表中国式亲情的“二十四孝”,其中对母尽孝的有近半数为十一人,对双亲尽孝的六人,其他类三人,对父尽孝的仅四人。

最有意思的是岳飞,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位名将的母亲以“岳母刺字”故事流传千古,岳飞的父亲则存在感

稀薄得几乎没有。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岳飞不仅有一位名叫岳和的父亲,而且他的一身武艺和仗义疏财很可能都是受父亲的影响。但在中国传统儒家的叙事中,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最终被抹杀掉了,一定要换上一位正史着墨不多的母亲,与岳飞一起上演刺字的戏码。

母子之情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儒家叙事中如此抢戏,是因为只有母子才能真正实现其所提倡的那种亲子之间不分彼此的“孝道”。在心理学上,婴儿从一岁到三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前俄底浦斯期”,在这段时期内,婴儿的脑中将自己和母亲当作一个不分彼此的整体,婴儿通过母亲感知整个世界,从这种“浑然忘我”的状态中感受快乐。过了三岁以后,随着父亲形象的加入,儿童就将认识到自己与母亲是独立而不同的个体,最终实现自己的独立。与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代起就鼓励人在性格上独立不同,中国文化因为“圣人”们独特的家庭背景和审美倾向,更欣赏个体将自己融入到集体中。于是,“前俄底浦斯期”那种“忘我”的母子关系就显得必不可少。这也就解

释了中国人为何如此“恋母”,甚至盛产“妈宝男”——我们在文化上其实并不鼓励人们跨过三岁这道门槛。

难道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就没有产生成熟一点或者至少想要成熟一点的思想家吗?其实是有的。比如东汉末年的孔融,从他早年“让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确知,这孩子至少幼年的家庭环境比较健全、富裕而乐观。所以孔融年长之后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孝道,甚至说:“母亲跟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孔融这种思路虽然有点偏激,但在中国古代其实不失为一种先声。就像一个孩子,在心智走向成熟的青春期总会有点怪言怪语。不幸的是,这点少有的小火苗,最后还是被掐灭了。曹操最终以孔融“不孝”为名而杀了他——即便奸雄如曹操,也不能容忍孔融这种思路,因为他深知这种思想的发展最终会导致那个“以孝治国”的帝国的崩解。

于是人们终于看明白了,原来强迫你恋母的,不仅仅只有文化。

【观影笔记】

《银河护卫队2》里最大的彩蛋——

史泰龙唤起的集体记忆

□韩松落

《银河护卫队2》片尾有五个彩蛋,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彩蛋,是出现在片子中间的史泰龙。他一共亮相两次,每次不超过一分钟,但制作方毕竟给了他特殊待遇,他是少数几个没有做特效化妆的演员。以裸脸上镜,在漫威电影里,这相当难得,是只有主角和特别出演者才会有的待遇。

其实史泰龙依然活跃在大银幕上,依然是主角,2015年有《洛奇》系列的衍生片《奎迪》,今年还将有《金蝉脱壳2》,稍早一点,还有《敢死队》系列,但感觉上,他似乎已经渐渐不在焦点里了。和他一样,同样在动作片黄金时代成名,也给人同样印象的,是施

瓦辛格。他的《终结者5》前年上映,《终结者6》也即将在这个月的月中上映,但他同样给人渐渐遥远、渐渐透明之感。

把他俩作为一个线头,会扯出更多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动作巨星,尚格·云顿、布鲁斯·威利斯、史蒂文·西格尔、查克·诺里斯,在三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他们是我们想起好莱坞时最先浮现的那几张脸。在那个年代,男生宿舍里贴在墙上的海报,是演员人气的真正排行榜,最常出现的面孔,男的是史泰龙、施瓦辛格、尚格·云顿、刘德华,女的是周慧敏、邱淑贞、酒井法子。标准的硬汉和娇娃,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青年对性



别气质的认识。

所以,张敏在微博上跟周慧敏联络感情,结果发错情诗、贴错照片,会引起那么大的震荡;酒井法子吸毒事发后,在中国占据了那么久的头条;大鹏在《煎饼侠》里向过往致敬,请来尚格·云顿。都是因为那段黄金时光吧。对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来说,周慧敏、酒井法子就是“女性”的代表,而史泰龙、施瓦辛格就是“理想男性”的化身。

原不难想见。美国的健身房文化,从“二战”之后,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慢慢发展到顶峰,肌肉男式的偶像出现在银幕上,是自然而然的事。而

对那时的中国青年来说,健身和健身房仍然是奢侈品,增肌药物更是传说中的物品。当时风行一时的《健与美》杂志里,很多健美冠军面对记者,往往在讲述他们是如何土法健身的,怎样用铁块制作健身器械,怎样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健身,怎样熬汤滋补。所以,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会在中国青年这里成为偶像,而且是遥不可及的偶像。一方面,是健身文化的顶峰,一方面,是健身饥饿和渴望,两者的错位,让他们在两个地方都成了全民偶像。

而那时的好莱坞,也在充分利用这些肌肉偶像的魅力,不停地为他们打造个人形象

主导的系列电影。史泰龙有《洛奇》《第一滴血》系列,施瓦辛格有《终结者》系列,尚格·云顿有《再造战士》系列,布鲁斯·威利斯有《虎胆龙威》系列。这些系列电影,都是依照他们的个人特质来定制,把他们的魅力推向极致。

系列电影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动作明星的专属,上世纪90年代后半段成名的杰森·斯坦森,有《玩命快递》《机械师》系列,范·迪塞尔有《速度与激情》系列,汤姆·克鲁斯有《碟中谍》,马特·达蒙有《谍影重重》。这些电影,或许更激动人心、更眼花缭乱,但特效的含量渐渐大过主演的形象含量,特效的魅力渐渐大过主演的魅力。

我有时会忍不住猜想,如果史泰龙遇到的是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否会有那样一番成就呢?应该还是会吧,毕竟,在动作明星身份之外,他还是杰出的编剧、导演和画家。但在时势的交错之中,这些才华,说遗漏也就遗漏了,说埋藏也就埋藏了,而我们看到的星光,其实都是侥幸。